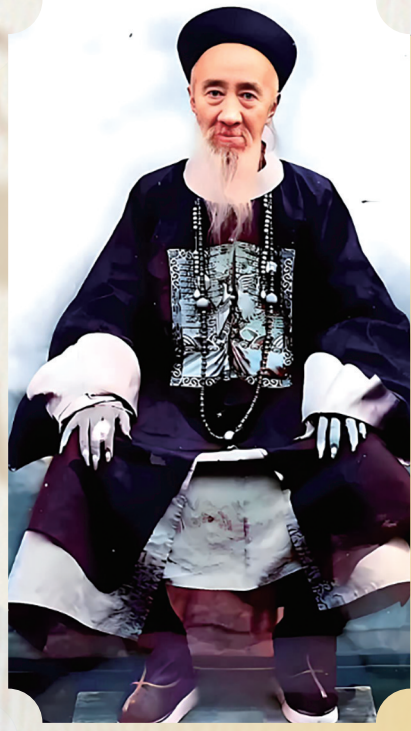


一代名臣“一生学问文章,肇基于此” 张之洞的老师都有谁?

张之洞,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(1837年9月2日)出生于贵阳,4岁随父来到贵州兴义府(治今安龙县),13岁回原籍直隶南皮应科举,后中顺天解元。16岁时返回兴义府,17岁成婚,18岁时携妻女返回原籍南皮准备高一级的科举考试。同治二年(1863年),张之洞高中探花,一举成名天下知。那么,神童张之洞是如何炼成的呢?他的老师都有谁?



张之洞

从张之洞参加乡试时填报的履历来看,张之洞在兴义府期间,先后有曾叙笏、袁理、张国华、贵天乙、黄政钧、王含章、敖国琦、彭拔才、包景肃、张元弼、韩超、童翬、洪调笙、胡林翼、丁嘉葆、翁同书等16人成为张之洞的业师。其中,丁嘉葆与翁同书曾任贵州学政,到兴义府举行院试时对张之洞的学

业进行了指点。包景肃是兴义府训导,张元弼是兴义府学教授,童翬曾任兴义府珠泉书院院长,曾叙笏、张国华、贵天乙三人是兴义府城优秀学子,黄政钧、王含章、敖国琦、彭拔才等人则是黔中翘楚,洪调笙是湖北人,袁理则是张之洞的姑父,上述各人都曾讲学于兴义府城珠泉书院,张之洞等人又附学于

此,故结下师生之缘。而韩超则是为筹措回乡资金,受张之洞父亲张铨之邀讲学于兴义府珠泉书院,张之洞又通过韩超“问业于胡文忠公(林翼)”,由此结下师生情谊。可以说,正是因为有了兴义府的学习生活经历,奠定了其一生学问文章的基础,才成就了后来的一代名臣张之洞。



张之洞拜师(源自安龙张之洞陈列馆)

学政授业 一生受益

在张之洞的求学生涯之中,有两任贵州学政成为了他的业师,那就是丁嘉葆和翁同书。

丁嘉葆(?—1848年),字涌孙,江苏武进人,道光十八年(1838年)戊戌科进士,选翰林院庶吉士。1846年,丁嘉葆以左庶子身份紧急接任丁忧离职的何桂珍,出任贵州学政。次年四月二十五日,丁嘉葆按临兴义府主持岁试,当时张铨离府到安庄公干,由兴义县知县陶金治代行提调事务。五月初六,张铨从安庄归来。十一日,应张铨之请,丁嘉葆对张之澹、张之清、张之渊、张之洞四人学业进行了精心指点。十四日,张铨率张之澹、张之清、张之渊、张之洞四人向丁嘉葆行谒师礼,丁嘉葆赠给

张之洞兄弟四人每人书扇一把,张铨也回赠丁嘉葆何首乌10斤。在此期间,丁嘉葆还应张铨之请,亲自写信给正在云南师宗丁忧的前任贵州学政何桂珍,邀请其到兴义府城讲学。何桂珍与倭仁、曾国藩等都曾师从于学大师唐鉴,经学造诣极深,是为滇中一代名儒。令人遗憾的是,丁嘉葆在教授张之洞的第二年即去世,师生二人就此永别。

翁同书(1810—1865年),字祖庚,号药房,江苏常熟人,道光二十年(1840年)进士。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七月,翁同书以翰林院编修提督贵州学政,以接替因病离职的丁嘉葆。后来,翁同书两度出任贵州学政,直至1853年才离开贵州。在此期间,翁同书数次到

兴义府主持院试,并对张铨主持修建的兴义府试院赞有加,“重门耸峙,广堂深阔,石柱凌云,皆佛楹句”。张之洞受业于翁同书,应是翁同书到任贵州学政之初的1848年,当时翁同书紧急接任因病离职的丁嘉葆。张之洞与翁同书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。同治二年(1863年),张之洞与翁同书之子翁曾源同系第一甲进士,翁曾源是状元,张之洞是探花,两人遂结下十分深厚的友谊。翁同书又系光绪皇帝老师翁同龢的大哥,张之洞与翁同龢之间又有诸多政见不和,张之洞曾自叹“此等孽缘,不解何也!”

后来,张之洞自言“得力于丁涌孙先生最多”,可见丁嘉葆、翁同书两位学政对其学业影响之深远,可谓一生难忘。



胡林翼(如图)虽然没有对张之洞直接教学,但他对张之洞的思想影响极大。

游学名师 一生成就

张之洞在《抱冰堂弟子记》中曾言“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……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,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”,那么,这些老师又是什么时候教授张之洞的呢?

吕贤基(1803—1853年),安徽旌德人,字羲音,号鹤田。道光十五年(1835年)乙未科进士,历任编修、监察御史等职。咸丰元年(1851年),升为工部左侍郎,后兼署刑部左侍郎。吕贤基师从湖湘学派经学大师唐鉴,并将唐鉴的《理学正宗续录》《国朝学案小识》进呈朝廷,“借以正学之助”,足见唐鉴对其影响之深。张之洞一生恪守唐鉴、吕贤基等古文经学派佳人的坚定立场,而深悉今文经学,曾明言“平生学术最恶公羊之学”。后来,张之洞说“经学受于吕文节公贤基”,还详细回忆了吕贤基对他的教诲:“先师旌德吕文节教不佞曰,欲用注疏工夫,先看《毛诗》,次及《三礼》,再及他经,其说至精,请申其义。盖《诗》《礼》两端最切人事,义理较他经为显,训诂较他经为详,其中言名物学者能达与否较然易见,且四经皆是郑君元注,完全无阙。《诗》则毛传粹然为西汉经师遗文,更不易得。欲通古训,尤在于兹。”足见吕贤基经学思想对他的影响之深。咸丰二年(1852年),吕贤基出任顺天府试主考,张之洞就是在这一

科高中解元的。

刘书年(1811—1861年),字仙石,河北献县人。刘书年幼年十分贫穷,“自十九岁以至成进士,率教授郡以养。”道光二十五年(1845年)进士,改庶吉士,授编修。道光三十年(1850年)到贵州任官,先后担任贵阳府、安顺府知府。刘书年曾师从曾国藩,并颇得曾国藩赏识,曾国藩还出钱200两予以接济。刘书年一生好学,生平著述颇丰,诗词文皆有可观。因与张之洞有姻亲关系,与张铨又在贵州为官,故对张之洞有教育引导之责。后来,张之洞在《抱冰堂弟子记》中直言“小学受于刘仙石观察书年”。刘书年去世之后,张之洞为其撰写《贵阳知府刘君墓志》,有云:“出同考官今毅勇侯曾公门下,最为曾公爱重,以学行相切磋。所友善如河间苗夔、善化孙鼎臣、贵筑黄彭年、遵义郑珍、独山莫友芝等,讨论学业,长不不衰。其在馆阁典册、军旅行役,忧患疾苦,未尝一日去书。晚尤好三礼之学,其经说笃守本朝诸大师,益务为详密。”字里行间透露出极深的师生情谊。

朱琦(1803—1861年),字廉甫,号伯韩,广西桂林人,张之洞生母朱氏的族兄。道光十一年(1831年)举人,道光十五年(1835年)进士,由翰林院庶吉士历官编修、给事中、御史。朱琦性格刚毅,屡上书论政,以直言敢谏著称于

世。朱琦在文学上专攻古文,早年曾师从桐城派门人吕璜,并与吕璜、龙启瑞、王拯、彭昱尧并称“岭西五大家”。道光二十年(1840年)之后,朱琦又与经学大师唐鉴及其门人倭仁等交往甚密,深受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理念的影响。朱琦在《跋倭良峰(为学大指)卷后》说:“先是十余年间,诸老宿在京师,数过从,质所疑,独先生与唐镜海、李文园两先生,一以程朱之学为学,士知尊信之。”道光二十六年(1846年),因不满当时朝政昏暗,朱琦愤而辞官归里,隐居于广西桂林。此后,朱琦一边主持桂山书院(孝廉书院),一边著书立说,试图通过教育和学术来激励世人。张之洞就是在此期间,从兴义府渡越南盘江,取道百色来到桂林,专程向朱琦求教。接着,张之洞取道湖南、湖北,回到原籍南皮,一举考入河北南皮县学。(有人言,张之洞曾到广西百色参加科举考试,大概是被这次求学经历误导)后来,张之洞在《抱冰堂弟子记》中直言“古文学受于从舅朱伯韩观察琦”,足见朱琦对其学业影响之深。

后来,张之洞一生兼学汉宋,在诗词方面“运宋意于唐格”,自成一派。在古文、金石学等各方面均有所成就,成为晚清学术史上不可多得的儒学名家,这与其早年求学于吕贤基、朱琦等名家不无关系。



胡林翼对张之洞的学业指导与影响应该是通过韩超(如图)来实现的。

潜心经史 一生致用

纵观张之洞的一生,经世致用理念贯穿其始终,这与其早年求学于胡林翼、韩超两位经世大家是分不开的。

胡林翼(1812—1861年),字岷生,湖南益阳人。道光八年(1828年),胡林翼之父胡达源出任贵州学政,胡林翼即随父到贵州求学,拜于贵东道即侯辰门下。道光十五年(1835年),胡林翼考取进士。道光二十年(1840年)出任江南乡试副考官,因主考官文庆携举人熊少牧入闱阅卷,以失察之罪降职调用。次年丁父忧,回籍守制。1847年,在林则徐、但明伦(贵州长顺人,兴义府城人景其浚之岳父)等人支持下到贵州为官,历署安顺、镇远、思南、黎平知府及贵东道。1854年离开贵州,参与湘军与太平天国的战斗,先后出任湖北按察使、湖北布政使、湖北巡抚。1861年8月逝于武昌,追赠总督,谥文忠。

胡林翼是湘军创始人之一,与罗泽南、刘蓉等人同为咸丰、同治年间湖湘

学派经世实学的践行者,他们的经世、改良思想及其实践活动在道光、咸丰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。他们在笃守程朱理学的基础上,反对空谈心性性命和沉溺章句训诂,提倡经世致用的躬行践履,以实而又实的学术实践丰富了晚清经世实学。胡林翼对张之洞影响最深的应该是军事战略。胡林翼在为官生涯中,将“儒术”作为军事行动的指导思想,曾言“兵事为儒学之至精,非寻常士流所能及也”,还曾致力于兵法研究,取《左传》《资治通鉴》等史籍中的军事内容编次成书,定名《读史兵略》,作为将领学习兵法的教材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从胡林翼的生平经历来看,他是没有到兴义府对张之洞直接教学的。他对张之洞的思想灌输应该是通过韩超来实现的,故许同莘在《张文襄公年谱》中说“尝问业于胡文忠公”。张之洞出任湖广总督之后,特地前往武昌胡林翼祠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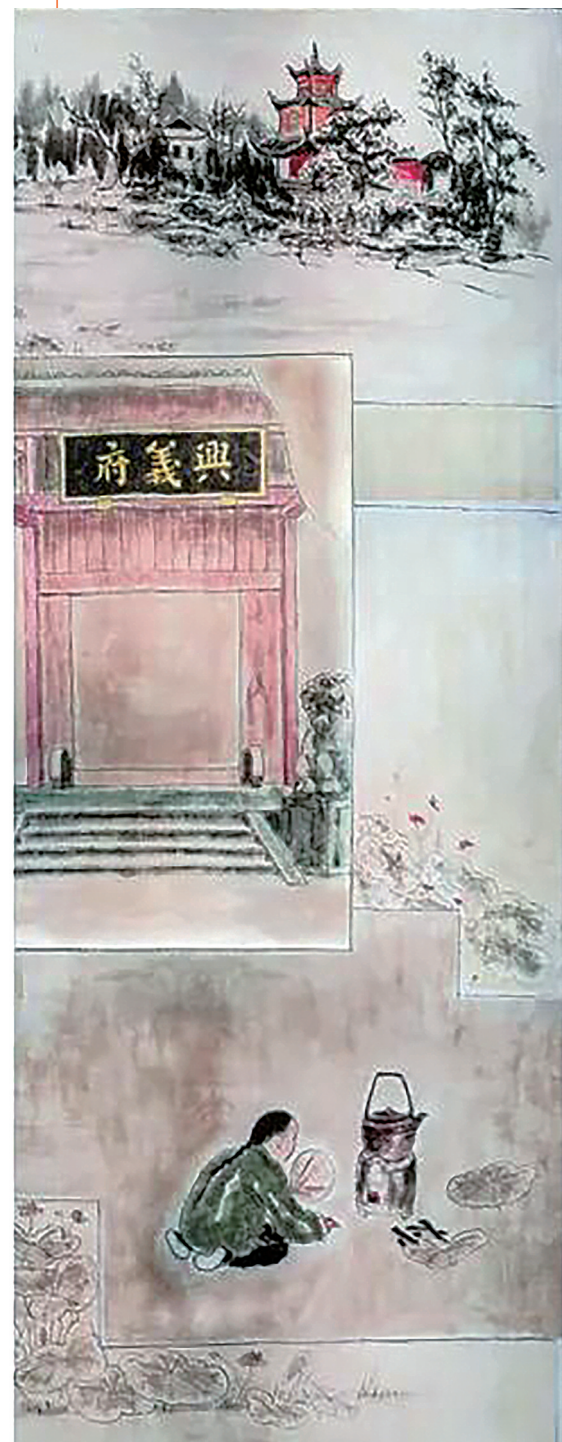
吊,并赋诗《谒胡文忠公祠二首》,云:“二老当年开口笑,九原今日百身悲。敢云钝笔能为役,差幸心源早得师。”“安攘未竟公遗憾,微福英灵愧有知。”充满了对胡林翼、韩超二人的感激、崇拜之情。

韩超(1800—1878年),字寓仲,号南溪,直隶昌黎人。嘉庆二十三年(1818年),考取秀才,此后连续13次参加乡试均未中(仅于1834年中副榜)。道光二十四年(1844年),经人推荐出任贵州三角屯州同,后改独山知州,道光二十八年(1848年)六月卸任。不幸的是,恰在此时,韩超之父因病在乡去世。为筹措回乡奔丧的旅资,应张铨之邀,韩超讲学于兴义府珠泉书院。道光二十九年(1849年)正月,韩超到达兴义府,当年底离开。在此期间,韩超对附学于此的张之洞进行了精心指点。胡钧重编《清张文襄公之洞年谱》载,咸丰五年(1855年)“三月,韩果靖公超提兵过余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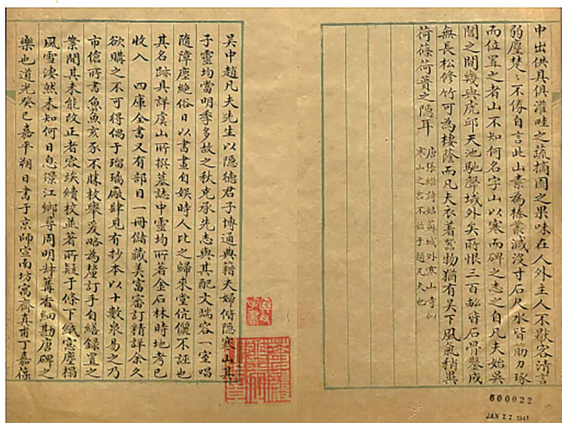
庆,得复修弟子礼”。可见,1849年韩超到兴义府对张之洞有教学之实而未行师生之礼,也可以看出韩超当时讲学于珠泉书院,而不是张之洞个人的业师。

从韩超的人生履历来看,韩超曾长期与胡林翼在一起,受胡林翼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。个人以为,胡林翼对张之洞的学业指导与影响应该是通过韩超来实现的,特别是胡林翼以儒学为核心,兵史结合的经世致用思想对张之洞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,张之洞又言“史学、经济之学受于韩果靖公”。

后来,张之洞以洋务实践为核心,开创性地丰富和完善了“中学为体、西学为用”的理论体系,与胡林翼、韩超等经世学派倡导的经世致用理念一脉相承,成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之一。同时,我们也可以清晰地看到,张之洞一生学问文章,其基础全部是在兴义府学习生活期间奠定的,这也是对“一生学问文章,肇基于此”的最好诠释。



幼年张之洞(安龙张之洞陈列馆展陈图片)



张之洞业师丁嘉葆校藏《寒山金石林时地考》页面。(资料图片)